

董輔初選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董輔初選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董辅弼选集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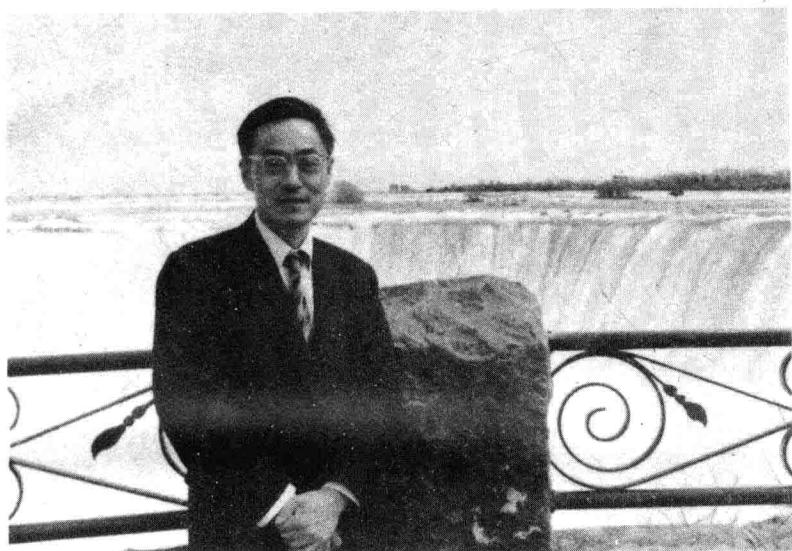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5 字数: 463 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

书号: 4088·94 定价: 精装 5.75 元



1982年4月加拿大尼亚瓜瀑布

希望在于改革

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逐渐走上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的经济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在巨大变革中，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在遇到这些困难和问题后，是继续沿着新的道路前进还是退回到老路上去，事关重大。下面我们粗就最近一段时间人们议论较多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关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近年来，在中国经济的调整中，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较大的下降。今年（1981年）前十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工业总产值只增长2.4%，其中，轻工业增长12.6%，但重工业却下降6.4%，预计今年工业总产值只可能有较大增长。由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轻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则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是缓慢的。因此，速度问题成为人们异常关心的问题。速度问题自

在学习经济学的道路上

——代自传

1946年我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从此同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武汉大学经济系，我名义上学习了四年，实际上，除了一年级算是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以外，其余三个年级我都把绝大部分时间用于从事学生运动和解放后的学生工作，真正用于学习经济学的时间是很少很少的。

尽管这样，在大学的四年中学到的东西，对我来说，仍是终身受用的。解放前，老师教的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不管其中的庸俗部分也好还是非庸俗部分也好，对于我这样一个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人来说，都是有用的，必须懂得的。我的一点浅薄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知识主要是大学的各位老师教授给我的。至今我都感谢张培刚、杨端六、刘秉麟、李剑农、戴铭巽、周新民等老师的教诲。那些经济学以外的课程，包括我在外系旁听的一些课程，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遗憾的是，对经济学及其以外的课程，我都没有学得更多更好，每每感到知识面太窄，不够用。我常常想到，要是我在大学期间把各门课程（包括自己应该选修和旁听的课程）都学好，我在工作时就会得心应手得多。知识这个东西很奇怪，当你不需要它或不用它的时候，你不觉得它的可贵，当你要用它而又

不能从大脑的储存库里取出来或者在大脑的储存库里没有它的储存时，你就会异常遗憾，有时甚至无计可施。例如，在大学里，我学过高等数学、高等统计学，但那时没有认真学，多年又不用，现在就后悔无及了。

在大学期间，我也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自然不是从课堂里学的，而是从课堂外学的。虽然，在中学期间，我接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从大学一年级开始的。那时，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求真读书会”，交流各自的读书心得。我要感谢从台湾回到祖国大陆来学习的两个同学，他们带来了日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向我们报告了他们的读书心得。他们的报告吸引了我。在正在兴起的学生运动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给了我们观察和解答腐败的社会中国困扰着人们的各种问题的钥匙。当时，能够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少得可怜，河上肇的著作是我的启蒙者之一，以后才读了一部分《资本论》，读了在香港印刷秘密传入内地的薛暮桥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最后读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尽管那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读得不多，更不系统，但终归是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上学步中的第一步，这第一步对我来说同时是决定日后人生道路的第一步，所以是重要的第一步，也是值得怀念的第一步。

“求真读书会”出过壁报，我写过一篇论述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的小文章。这是我写的第一篇经济学文章。文章里写了些什么，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无疑一定是非常幼稚的。以后，直到在苏联作研究生前，我再也没有写过经济学的文章。其他方面的文章，甚至诗，我倒写过一些，也发表过一些。

1950年，我在大学毕业了，留在经济系作助教。那时，刚解放不久，各方面都严重缺人，许多同学还没有毕业，我被调出学

校，参加了热火朝天的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说实在的，留在学校工作，非我情愿。组织的这一决定，确定了我的一生必须走在经济学的道路上。或许我是幸运的。因为，在我的同窗学友中绝大多数人都离开了经济学专业，其中不乏对经济学既有兴趣又富才华的人。有些学友在离开经济学将近三十年以后，才重新回到经济学的道路上来。而我则一直在这条道路上走着。在担任助教期间，我忙于其他工作，担负的教学任务很少，在经济学上可以说没有多大长进。

1952年，学校选送我到苏联作研究生。在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学了几个月俄语以后，1953年秋，我进入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这是一所在经济学方面在苏联有着很高地位的学校。在那里，我度过了四年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也正是在那里，我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系统地学习了国民经济计划原理和国民经济平衡理论，学习了作经济理论研究，为我日后在经济学的道路上攀登打下了基础。四年时间不长，但那是扎扎实实学习的四年，几乎全部时间都用于学习的四年。学校为我定的导师是布列也夫，那时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我国第一批国民经济计划原理的教师就是他培养出来的。他在波兰、东德也培养过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他在国民经济计划原理方面有自己一套理论和分析方法。他的著作不多，但他治学严谨，思路严密。在他回苏联前，图列茨基代理我的导师工作。他在国民经济平衡和成本价格方面是苏联有名的专家。他的著作不少，思想敏锐，才气横溢。我从他们两人身上学到了不同的治学之道。在我写作学位论文《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收入动态》时，就运用了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包括某些理论观点和分析问题的方法。

在苏联的学习也有缺陷。那时，苏联经济学界对西方的经济理论采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的态度，除了批判以外，没有将可

以吸收的东西吸收过来，为我所用。数量研究受到严重忽视。这种情况从1959年前后才开始有所改变，而在我的学习期间，则使我学到的知识也具有缺陷。当然，在苏联，有些经济学家也或多或少看到了这种情况。我的学位论文的评审者之一，斯米霍夫就是这样的。他有很好的经济学和数学的修养。我在论文中运用了一些数量分析，就得到了他的肯定。

1957年回国后，我回到武汉大学任教，在此期间，我将学位论文中的前一部分整理成一本书——《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于1959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也是我写的经济学著作中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著作。

1959年初，孙冶方同志调我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从此我成了一个专业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我在经济学的道路上有了新的开端。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并没有完全脱离教学工作，几乎每年我都要回到武汉大学授课。从我的经验来说，理论研究工作兼教学工作，或者教学工作兼理论研究工作，是很有好处的，可以使科研与教学互相促进。至今，我有时也还到学校去授课。

在经济研究所工作，使我在经济学上得到许多长进。孙冶方同志给了我许多教诲，也为我创造了许多获得长进的机会。我是在1956年夏认识他的。那时，他率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考察团到苏联访问，我给这个团担任一部分翻译工作。到经济研究所后，我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同时也参加了他的或他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包括他主持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活动。他的人品和学问都给我以很大教益。经济研究所有一个较好的集体。这里有许多各有所长的专家、同事，能帮我释疑解惑，甚至使我在不知不觉的耳濡目染中获益长进，特别是孕育各种学术思想。

从1959年到“文化大革命”，除了1961年到1963年较为稳定以外，生活颇不平静，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接连不断，而经济学又总是处于斗争的漩涡。在那些岁月里，我利用政治运动以外的余暇继续着在苏联开始的研究工作，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局限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平衡问题，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1980年，由三联书店（继由人民出版社重印）的《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一书，就是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的选集。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方面，我试图使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具体化，本打算写出一组文章，“文化大革命”前只完成了其中的四篇。对于国民收入问题，特别是国民收入的使用——消费和积累问题，我也作了一些探讨。不少朋友比较看重我在这几年写的文章，并鼓励我把那时的研究课题继续进行下去。我也有此想法。但因为工作的关系，至今没有实现。那时，我为自己确定了一条方针：对自己选定的专题进行长期系统的研究，“以不变应万变”，即离开自己的专题的任务（特别是临时任务）变更再多，在完成了这些任务后，就回到自己的专题上去。我想，在那段时间，我在理论研究工作中如果取得了象样一点的成绩的话，同信守这一方针是有关联的。无疑，完成离开自己专题的任务，不仅是责无旁贷的，而且对于自己的专题研究也是有帮助的。

从1964年秋天起到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经济研究所的工作停止了，我自己研究工作也中断了。在1975年至1976年间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被借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新组建的经济研究所。在“四人帮”发动的“批邓”的形势下，这一年是在无所事事中度过的。那时，我抓过《国民经济计划和统计辞典》的编写，刚有了眉目，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它就在胚胎中夭折了。

1977年我回到经济研究所工作，至今又过去了七年。这是我

国经济大变革的七年。这七年，在肃清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中的“左”的流毒中，在拨乱反正中，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中，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结构在发生大的变革，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发生大的转变，我国的经济结构在发生大的变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在发生大的变革……，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在发生大的转变。由于工作的关系，特别是由于这种种变革是那样激动人心，那样引人注目，我也被吸引过去，参加大转变时期各种经济理论问题的探讨。收集在《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理论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一书中的文章以及其后的文章，就是为探讨这些问题而写的。在这段时期，我还同其他同志一起编写了两本书：《“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初版，1980年修订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优越性》（北京出版社，1981年）。1983年2月，孙冶方同志去世了。为了宣传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缅怀他对自己的教诲，我写了《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和其他文章。

我在这段时期写的文章涉及的领域和课题比“文化大革命”前要广得多，而且不少课题属于我不熟悉的政治经济学领域。我自知，涉猎这样广，这同我过去信守的方针是不一致的，会障碍对问题的深入研究。但是，从这几年的工作中我也有所得，这就是扩大了自己的思路，使能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把握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研究工作能更好地伴随时代脉搏的跳动。不过，如果条件容许，我仍应对我熟悉的专题进行长期的系统的研究。近年来，我逐渐开始拣起了中断研究已久的部分课题。

以上就是我在经济学的道路上经历的途程。

马克思把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比作崎岖陡峭的山路。我从

未奢望能沿着这条道路攀登到光辉的顶点。但我愿意努力在这条道路上和众多的同行共同攀登，希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可能攀登得高些。

董辅初

1984年7月9日识

目 录

在学习经济学的道路上

——代自传·····	(1)
------------	-------

基本理论和国民经济综合问题

关于生产力的几个问题·····	(1)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17)
大转变的中国经济·····	(33)
希望在于变革·····	(48)
国民经济平衡的几个问题·····	(58)
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调整问题·····	(84)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	(94)
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100)
浅议社会主义流通二三题·····	(116)
关于新疆的经济效益问题·····	(131)
从郑州下坡杨大队的发展中所想到的·····	(142)

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155)
----------------------------	---------

结合十条经济建设方针进一步开展对我国经济发展

- 战略的研究…………… (168)
- 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 (176)
- 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问题…… (208)

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 努力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225)
- 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
 - 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 (230)
- 经济利益、经济杠杆和经济组织…………… (245)
- 不能用小生产的方法管理社会主义大生产…………… (261)
- 价值规律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268)
- 国民经济平衡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289)
-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性质和地位问题…………… (295)
- 凤阳农村观感…………… (310)

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具体化问题

- 从社会产品生产和使用统一的角度探索马克思再生
 - 产公式具体化问题…………… (317)
- 关于不同扩大再生产途径下的社会主义再生产比例
 - 关系问题
 - 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具体化问题的再探索…………… (340)
- 产品的分配和使用与两大部类比例的关系
 - 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具体化问题的探索之三…… (366)
- 论社会再生产诸比例与积累和消费比例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具体化问题的探索之四·····	(391)
---------------------------	---------

国民收入的积累和消费问题

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讨·····	(420)
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	(438)
关于贯彻“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原则的问题·····	(455)
论价值——货币形态与使用价值——实物形态的积 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的平衡问题·····	(464)
价值——货币形态与使用价值——实物形态的积累 基金和消费基金在总量上的不平衡问题·····	(492)
关于消费问题的探讨·····	(511)
关于消费领域和消费过程的几个问题·····	(529)
消费额、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	(546)
关于提高消费的效果问题·····	(560)
经济利益和消费效果 ——兼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消费问题的研 究·····	(576)

发展经济科学问题

肃清极左流毒，发展经济科学·····	(588)
经济科学必须在实践中前进·····	(603)
不能狭隘片面地理解理论联系实际·····	(607)
后记·····	(611)

基本理论和国民经济综合问题

关于生产力的几个问题

生产力问题是经济科学中研究得最差的问题之一，甚至长期被排斥于经济科学的研究领域之外。在这篇短文里，我只想就其中三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一、劳动对象是否生产力的一个因素？

生产力包括两因素或三因素，或者说劳动对象是不是生产力的因素，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两因素论。但从生产实践来看，特别是从近几十年的生产实践来看，两因素论是站不住脚的，且对实践是有害的。

要谈生产力因素，首先要谈谈什么是生产和生产力。

马克思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①恩格斯把生产看作是“人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0页。

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①。列宁则说：“在任何社会生产制度下，生产总是工人对物质和物质力量的‘影响’。”^②概括这些意思，所谓物质生产就是人们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作用于自然提供的物质和物质力量，将其改造为适合人们需要的产品。所谓生产力也就是人们把自然提供的物质和物质力量改造为适合自己需要的产品的实际力量。这种力量，固然决定于生产工具的状况以及具有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力的状况，同时也决定于劳动对象的状况。

主张两因素论者认为，既然生产力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劳动对象则是自然提供的物质和物质力量，是被改造的自然界本身，那么劳动对象就不能成为生产力的因素。同时，劳动对象能不能被改造为并在多大程度上被改造为适合人们需要的产品，则要取决于人和劳动工具，因此它也不决定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这种论点，对于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也许具有某种程度的道理。因为那时人们靠采集、捕捞、狩猎为生，他们采集、捕捞、狩猎的果实、鱼虾、野兽等等，都是自然已有的，换句话说，劳动对象就是自然界的本身。在人类社会脱离原始状态以后，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虽然还有一些劳动对象是自然界已有的，是“天然存在的”，如采矿业、狩猎业、捕渔业，以及最初开垦处女地时的农业等等，但是，“除采掘工业以外，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③这些劳动对象，就它们是劳动产品这一点来说，同生产工具是没有区别的。例如，农业中的种子，并不是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458页。

②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181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6页。